軒尼詩改革前的香港監獄鞭刑

王文晶 * 張坤 **

摘要 通過對英國議會文書中相關資料的詳細解讀，本文揭示了軒尼詩改革前對香港華人司法不公的細節問題。軒尼詩在1877年擔任香港總督之初，即發現香港監獄中存在著對華人濫施鞭刑的問題。透過對香港監獄濫用鞭刑的實際了解，軒尼詩質疑了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對香港鞭刑的殘酷性現實予以揭示，最終提出了改革鞭刑的建議，從而開啟了一系列刑罰改革的先聲。

關鍵詞 軒尼詩；香港監獄；鞭刑

鞭刑作為古老的刑罰，在世界各地一度廣泛存在。在英國佔領香港最初幾十年中，鞭刑在監獄中的使用十分普遍，尤其針對華人犯。然而從1877年軒尼詩（Hennessy）擔任第八任港督起，香港的鞭刑引起了她特別的關注，從而開啟了以減緩鞭刑為抓手的一系列改善香港華人處境的改革措施。這時期香港的鞭刑究竟呈現何等狀況，其原因何在，軒尼詩如何推動香港鞭刑改革，關於這些問題，目前已有的研究尚未給出明確答案。以下根據《英國議會文書》（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和《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的相關資料對上述問題進行闡述，以期豐富早期香港司法史的認識。

一、1877年以前鞭刑在香港的濫用

對罪犯施以鞭刑，究竟是英國古老刑罰的延續還是中國歷史上笞刑的變體，在這裡並不十分重要。十九世紀，英國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幾乎都有鞭刑，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英國在殖民地實行對白人和當地人刑罰的雙重標準。就英國本土而言，鞭刑於1718年被流放取代，後因人民怨恨絞刑和流放而一度於十八世紀60-70年代死灰復燃。¹這就意味著，在英國本土，鞭刑是作為一種酷刑而存在的，它不應被廣泛使用。但在香港殖民地，鞭刑卻一度廣泛地存在著。以下為香港和英國本土鞭刑情況的比較。

表一為1867-1876十年間香港每年受鞭刑的人數及鞭刑次數，數據來源於1867年1月1日至1876年12月31日的監獄記錄。²由此可知，這10年間的鞭刑總數為1,945下，受刑人數達1,555人。在這十年當中，少則每隔兩天就有中國犯人被打，多則

* 王文晶，暨南大學中外關係史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 張坤，史學博士，暨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英關係史及澳門史。

本文為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鴉片戰爭後港澳對外貿易文獻整理與研究”（編號：16ZDA130）階段性成果之一。

城市形象

	1867.1.1-12.31	1868.1.1-12.31	1869.1.1-12.31	1870.1.1-12.31	1871.1.1-12.31	總數
受刑人數	176	218	105	91	108	698
鞭刑次數 (平均每年 為 173 鞭)	209	255	130	128	146	868
	1872.1.1-12.31	1873.1.1-12.31	1874.1.1-12.31	1875.1.1-12.31	1876.1.1-12.31	總數
受刑人數	149	289	187	119	113	857
鞭刑次數 (平均每年 為 215 鞭)	192	341	244	159	141	1,077

表一 · 1867-1876年香港的鞭刑（分兩部分，軒尼詩整理）

地區	1871.4-1876.7 的鞭刑次數	人口
英格蘭	4,988	24,000,000
蘇格蘭	679	3,400,000
愛爾蘭	34	5,250,000
香港	1,149	140,000

表二 · 英國本土和香港鞭刑比較（軒尼詩整理）

幾乎每天都有人受鞭刑。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受刑人數和鞭刑次數出現偏差，是因為有的犯人一年內會受兩次甚至三次鞭刑。有時兩次鞭刑之間的間隔太短，犯人身上的鞭傷還未痊癒就要受第二次鞭打。表二為英國和香港鞭刑情況對比圖。³ 這組資料來看，只就英格蘭一島而言，人口為2,400萬，香港人口為14萬，香港不及英格蘭人口的千分之六，而鞭刑次數高達1,149次，佔英格蘭的23%，香港監獄過量使用鞭刑的現象可見一斑。在此時期的香港監獄中，大大小小的案件幾乎都使用鞭刑。被判處鞭刑的犯人最常見的罪行是盜竊罪（larceny），通常判以10鞭（有時為5鞭）；吸煙、打架、污言穢語、頂撞獄卒、上工拖延、毀壞樹木、偷食物等罰以5到12鞭不等。⁴

由上述可見，香港監獄中的鞭刑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到了濫用的程度。對華人犯尤其如此，其所受的懲罰有鞭刑、苦役和監禁。鞭刑尤為常

見，“幾乎所有華人犯都要受到鞭打，數目從20到100鞭不等。很少人會受100鞭，大多數為40到50鞭。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表一的資料並不僅僅是針對華人鞭刑的統計，也包括白人在內。香港殖民地醫生艾爾斯（Ayles）在1877年7月6日的報告也明確指出“有兩個歐洲人（一個士兵，一個水手）在受刑後並未出現以上情況（肺病）”。⁶ 由於香港監獄中白人數量很少，對其濫施鞭刑的問題並不明顯，相反華人遭受過度鞭刑的情況引起了軒尼詩的關注。

二、對香港鞭刑的合法性質疑

軒尼詩對香港鞭刑的濫用進行指責，其鋒芒直指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他在1877年7月6日致卡納芬伯爵（Earl of Carnarvon）的信中，再次提到過度使用鞭刑的問題，他稱：“據我所知，英國沒有哪一部法律給於香港法官和巡理府如此廣泛使用鞭刑的權利。”⁷ 針對軒尼詩的質疑，香港維多利亞監獄代理監督（Acting Superintendent）湯姆林（Geo. L. Tomlin）在1877年6月27日特別發表了《關於公開鞭刑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坦承“我沒有注意到任何有關公開鞭刑的法令”，僅僅對鞭刑的執行情況進行了說明：

（一）由最高法院判處的公開鞭刑在香港長辦公室（harbour master's office）

附近的鞭刑台執行，由典獄官和殖民地醫生監督。

(二) 鞭刑工具為九尾鞭，其規制與1865年5月1日殖民地事務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al) 頒佈的265號《參閱輔政司的信》(vide colonial secretary's letter) 中規定的一致。

(三) 除非收到來自高等法院的犯罪日曆 (criminal calendar)，否則不會執行鞭刑。

(四) 犯人在受刑前都會由殖民地醫生進行檢查，以確定其身體能夠接受懲罰，由醫生開出證明並提交給港督，然後港督允許在警察局規定的時間裡執行鞭刑。

(五) 犯人在受刑後會在殖民地醫生那裡接受治療，直到其背部傷口痊癒。⁸

由上可知，香港的公開鞭刑並未有專門的法律依據，但被殖民地政府執行，其鞭刑工具正是依據殖民地大臣的筆頭說明。可以說，鞭刑是英國政府對殖民地刑罰區別對待的產物。至於什麼樣的犯人要接受鞭刑，上述聲明中未有明確區分，根據第3條，似乎所有罪犯都會接受鞭刑。其中所提到的鞭刑前醫生的檢查和鞭刑後的治療表明殖民地政府並未完全拋棄人道主義，至於具體的情況則另當別論。

在香港殖民地，“港督的高度集權是19世紀香港政治制度的中心環節”，⁹港督擁有立法權、行政權和一部分司法權。在法治方面，有經諮詢立法局後制定香港法律和法例的全權，赦免罪犯和宣佈緩刑之權等等。¹⁰港督軒尼詩提到他的前輩奧斯汀先生 (Mr. Gardiner Austin) 3月14日的信件，其中提到“他免除了兩個中國人的公開鞭刑，他們犯‘在港口船隻上搶劫，且攜帶攻擊性武器’罪，被判以服五年的苦役。”而在軒尼詩到達香港後的幾天，“有另外兩個中國人被判以服三年的苦役以及各受三次鞭刑，其中之一被定罪為綁架罪，另一個為搶劫和傷害罪。”¹¹可見總督有權赦免對犯人的鞭刑，而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鞭刑是對所有被

判決犯人的一項附加懲罰。

香港殖民當局對鞭刑有無明確的規定呢？答案是肯定的，軒尼詩在1877年8月30日致卡納芬伯爵的信中明確了這一點：

1863年的第四號法例的第九部分規定：監獄監督 (Superintendent of the Gaol) 可以對犯有重罪的犯人判以體罰，但不得超過12鞭。在查看回件時我發現在實際操作中，監督通過給一位犯人判處兩次鞭刑而將其一天內鞭打24鞭。¹²

由此可以看出，監獄監督無視既定制度，擅自對罪犯施以過度鞭刑是問題的另一根源。

監獄監督何以如此漠視法規？或者我們可以將此視為他們在懲罰犯人方面有酌情處置的廣泛權利，但在一般情況下，對犯人判處第二次的鞭刑需報請總督批准。軒尼詩提到，在他視察監獄“兩到三周後，輔政司 (Colonial Secretary) 向我要指令以對區亞富 (Au-a-fu) 和任亞滿 (In-a-man) 執行第二次鞭刑。他對此感到猶豫”，¹³可以肯定，他的前任們不細查情況而草率地授權的做法定然存在，這是導致監獄監督濫施鞭刑的潛在原因。律政司 (Attorney General) 在1877年10月27日致輔政司的信中指出：“據我推測，監獄監督並不是在所有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只有在1863年的4號發令中授權監督可以給犯有重罪的犯人施以懲罰。”而監獄監督們自己也有一些實際的理由。比如有的犯人因試圖越獄而遭受了額外的鞭刑，¹⁴另外還有誤判。湯姆林本人承認在一些案件中他做出了錯誤的判決，他為自己辯解道：“在做這些判決期間，監獄有大量的罪犯需要處理，許多時候我每天需要調查案子超過30件。”¹⁵對此，律政司菲力浦 (G. Phillippo) 也認為，地方法院事務繁多，偶爾出錯並不奇怪。¹⁶

三、鞭刑的殘酷性

香港鞭刑的殘酷性首先在於其刑具的獨特性上。監獄使用的鞭子起初為藤鞭，後以九尾鞭代

城市形象

替。¹⁷ 九尾鞭，英語中為“cat”。九尾鞭沒有固定的長度，手柄上連著九條小鞭子（小鞭子有時數目不等）。九尾鞭的使用給犯人的身體帶來嚴重損傷，殖民地醫官威爾斯（Wells）和奧布萊恩（O’ Brien）醫生說：“我們認為九尾鞭是一種很重型的刑具，它的影響可能會深入到細胞和肌肉組織，導致物質的流失，使得傷口長時間難以癒合”。¹⁸ 鞭上的結增加了其著力時的傷害度，使得這種鞭刑的殘酷性大增。

使用九尾鞭一度被香港的法令所禁止。1862年的第六號當地法令規定，所有施於犯人的鞭刑必須使用藤鞭。1877年代理監督（Acting Superintendent）達科特（Captain Ducat）做了一份文件表明：1873年監獄中的違法鞭刑案件總數達225件。¹⁹

相比較而言，同時期印度的鞭刑刑具不似香港的殘酷。“在印度，鞭刑一般為臀部受刑，使用四尺長，和男子食指一樣粗的鞭子。”²⁰ 艾爾斯醫生在1877年7月6日的報告中指出，“在我過去八年的經驗裡，我從沒有見過比九尾鞭給皮膚帶來的傷害更嚴重的傷了。”他進而以一些受過該刑的犯人情況進行說明：

有一個犯人，他在受鞭刑後，臀部形成了一個很大的腫塊；還有一人，受刑後其傷口在六個月之後也沒有完全痊癒。（此人在1878年3月1日被罰用九尾鞭打36鞭，在5月14日檢查時，傷口未痊癒，仍在潰爛。到6月3日，儘管潰爛的部位表面上看起來好了，但傷口依然沒有痊癒。直到9月初檢查時，傷口也未完全癒合。）此外，九尾鞭還會在犯人身上留下永久性的疤痕。艾爾斯的調查報告中指出，九尾鞭會給犯人背部留下永久性的傷疤，而在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裡，中國下層勞動者做工時通常袒露上身，這樣就會露出他們身上的鞭痕，從而受到同伴的嘲諷，造成一種精神上的折磨。艾爾斯還提出，鞭刑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肺水腫。有一個叫莫亞貴（Mok a kwai）的犯人，他犯有很嚴重的肺病，肺部頻繁出血。而他並沒有肺病病史，且在他進監獄之初他的身體“強壯有力”。

他身體垮掉主要是由於這些年在監獄中他所受的各種懲罰。²¹

對此，斯諾登法官（Mr. Justice Snowden）在總體上認為刑罰不應違背人道和公正的前提下，認為艾爾斯醫生的“陳述並沒有足夠的可靠依據，所有背部受過鞭刑的中國人會患有不同程度的肺病這一說法肯定不能形成定論，艾爾斯醫生對於莫亞貴之前的健康狀況明顯沒有足夠的了解，所謂的獄卒的陳述在許多方面缺乏，信息是毫無價值的。他身體健壯並不意味著他不會感染肺結核以及遺傳有其他病症。”²²

軒尼詩記錄了自己參觀監獄時令人震撼的一幕：“在醫院裡，有兩個瘦弱的病人爬到我腳邊哭，他們看起來非常虛弱。從翻譯那裡我了解到，這兩個人就是5月10日受鞭刑的人。他們哭訴說他們的肌肉被嚴重撕裂以至於傷口無法癒合，晚上無法入睡。湯姆林先生說，他們的傷口至今還未癒合。在他21日的備忘錄中記錄了這一事實：

區亞富（Au-a-fu），於1877年4月23日判刑，在5月10日下午4點受第一次鞭刑。19日仍有12處傷口在流血。任亞滿（In-a-man），1877年4月26日判刑，在5月10日受第一次鞭刑，19日，仍有8處傷口在流血。大約十幾天後，我和史密斯先生參觀監獄，我們看到這兩個犯人的背部仍在流血。兩到三周後，殖民大臣（colonial secretary）向我要指令，以對區亞富和任亞滿執行第二次鞭刑。”²³

上述記載呈現了受鞭刑罪犯的悲慘處境，同時提到犯人第二次施以鞭刑的問題。作為港督，軒尼詩有權根據監獄監督的提請發出第二次鞭刑的指令，但他在這種情況下猶豫了。為了解“犯人如此虛弱以及傷口癒合非常緩慢的原因”，軒尼詩做了一些調查，發現對即將接受鞭刑的犯人進行懲罰性飲食——白水加米飯是罪魁禍首。這是去年監獄委員會對中國犯人飲食的新規定，而卡納芬伯爵曾在去年5月7日第25號文件中予以反對，但目前已經被嚴格執行。²⁴

也即，伴隨著鞭刑同時進行的懲罰性飲食致使犯人傷口癒合緩慢，無形中成為鞭刑殘酷性的另一種表現。監獄規定，在受鞭刑之前的幾天裡，犯人只許吃白水和米飯（rice and water），沒有任何調味品，這不利於人的身體健康。殖民地醫官針對取消中國犯人日常飲食中的酸辣醬這一事件稱，“酸辣醬中的調味品在幫助犯人消化大量的米飯中是必須的，取消酸辣醬會引起消化器官的許多問題，如消化不良、胃絞痛、腹瀉等”。他還指出在印度，沒有遵循他所提出的食譜被認為是引起麻風病的原因之一。除懲罰性飲食外，犯人還要服“最繁重的苦役”，²⁵他認為這些都成為犯人在受鞭刑後傷口長時間不能痊癒的原因。

鞭刑的當眾執行問題也引起了軒尼詩的關注。“鞭刑為當眾公開執行，執行時犯人背部貼著漢字寫的標籤，從監獄押至執行鞭刑的鞭笞台（位於上集市（upper bazar）的最西面），在那裡受刑，然後再押至監獄”。²⁶軒尼詩曾轉引香港一位歐洲名流的說法：“把半裸著的中國犯人押到擁擠的街道上遊行，公開展示英國獄吏揮舞著有力的臂膀鞭打中國人流血的身體……這一場景是大多數小孩從這個文明政府中所接受到的唯一的一課”。²⁷他以此表明公開鞭刑損害了香港政府的文明形象，製造恐怖場景，容易引起華人的敵對情緒。

對此，奉命進行調查的斯諾登法官也坦言：“我一直認為公开展示一種痛苦的刑罰，其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對一個受了很重懲罰的人，圍觀者並不知道他受罰原因，就會將其視為受害者而同情他。如果他毫不退縮且很勇敢的接受懲罰，會引起群眾的讚揚，疼痛就會降低，懲罰也就不那麼重了。”²⁸

此外，還有香港華人監獄的擁擠狀況。1877年5月艾爾斯醫生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犯人的居住面積遠遠低於平均水平，可想而知當時的華人生活在怎樣的環境裡。監獄過於擁擠，通風不暢，再加上天氣炎熱，空氣污濁，使得犯人極容易感染、生病。軒尼詩多次指出，犯人受刑後傷口不易癒合，以及易感染肺病，與監獄擁擠密不可分。²⁹

他建議在昂船洲另建新獄，但未獲得英國殖民地部的同意。³⁰

四、莫亞貴鞭刑致死事件

軒尼詩注意到一個名叫莫亞貴的中國犯人，他被非法鞭打四次，並於1877年9月28日因肺結核死於獄中。根據殖民地醫官艾爾斯醫生對其死因的審理記錄，此人為一位舊刑犯，且患有肺結核，“讓他出獄的有一半原因是他大部分時間住在醫院。從判決到現在他一直住在醫院，我給他開了他目前無法出席犯罪審判的證明。昨天他因肺結核而死在醫院。他患有肺結核病已有很多年了。”以下為莫亞貴接受鞭刑的記錄：

1873年8月4日，莫亞貴因“製造噪音”被監獄監督（superintendent）罰以背部鞭打6鞭。1873年10月6日，他因“製造噪音”被以同樣的方式處罰。1873年12月13日，他再次因“製造噪音”被罰以背部鞭打3鞭。

軒尼詩據此引用艾爾斯醫生關於“鞭打中國人和其他東方人背部會導致肺充血，而且有時會導致不可治癒的肺結核病”的論斷（斯諾登法官對此持異議），認為“儘管在1873年莫亞貴只受了15鞭，但這有可能已經為其最終的死亡埋下了種子。”根據他的調查，莫亞貴“經常患有一些小病，例如支氣管炎，但事實上他一直不被允許入院治療，直到1876年5月因肺結核住院，一直住到1876年10月。”但隨後的出獄及再次入獄並被施以鞭刑給莫亞貴虛弱的病體以最後一擊：

1876年10月30日早晨，他因持有“違禁物品”被罰以背部鞭打6鞭（那時他還在生病），隨後被流放的。

九個月後他因在流放期間返回香港而再次被捕。據艾爾斯醫生說，莫亞貴重新入獄後即因“肺結核晚期”送到醫院。他病的很重以至不能出席審判，後死於9月28日。

因莫亞貴在獄中所受的鞭刑並非因為犯有重罪，這促使軒尼詩調查香港鞭刑的合法性問題。

城市形象

根據律政司 (attorney-general) 提供的相關文件，莫亞貴被施行的體罰沒有法律依據。不僅如此，如前文所提及，以莫亞貴為代表，大多數犯人所受的鞭刑都是不合法的，除了使用九尾鞭代替藤鞭外，還有多次接受鞭刑的問題，其中“1873年監獄中的違法鞭刑案件總數達225件。”

莫亞貴事件中還有另外的違法行為，即港督簽署的將莫亞貴解除拘捕並流放的命令未得到正確執行。港督命令並宣佈：“解除對莫亞貴的監禁，從今日起五年內禁止在香港殖民地居住。1876年10月21日。”然而，莫亞貴在10月21日並未被解除監禁，而是在10月30日被鞭打後流放。

軒尼詩指出，不僅是莫亞貴，還有前文所提及的其他一些犯人都接受了與鞭刑相配合的懲罰體系，包括單獨囚禁3天和期間的白水泡飯，而莫亞貴則接受了6天同類懲罰。³¹

作為回饋，律政司認為監獄監督“並不是在所有案件中做到有法可依”，但並不認為對莫亞貴的最後兩次單獨監禁和白水泡飯的懲罰有任何問題，他的結論是：“我認為在對待莫亞貴的案子上監督是公正的，給他施以這種懲罰是因為他接連犯罪。”³² 這裡所說的“公正”是基於香港監獄對屢次犯案的犯人會額外施加懲罰，而莫亞貴符合這種情況。

上述莫亞貴入獄的原因主要有：“製造噪音”、持有“違禁物品”以及在流放期間返回香港等。軒尼詩指出這不是一些很重大的罪行。但這些罪行定罪的依據是什麼？這就不得不提及香港殖民政府單單對華人實行的一些限制性管理。

1844年11月13日，立法局通過第18號法例，規定華人除政府僱員及年納地租250元以上或收入500元以上者免予登記外，其他成年男性必須每年赴華民政務司署登記。若查明系“良民”，即由華民政務司發給“編票”，准予在港居住。沒有“編票”的人，任何人都不得僱用或收留，違者重罰。此外，還有其他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章程，如1864年香港政府頒佈公園章程，其中第三條規定：“中國技工和勞工不准在園內穿行”。第六任港督麥當奴

和第七任港督堅尼地都對華人採取歧視性政策，華人不得在歐人區居住，甚至不得與歐人同時進入香港大會堂 (city hall) 的圖書館和博物館。³³

再如宵禁令。1842年10月4日，港英政府以治安為由明文規定禁止華人居民夜行；1843年，港英政府還實行了禁止夜航的宵禁。後來，宵禁令又規定華人過了出行的時間，不僅要攜帶手燈，還要帶從“差館”領取的“夜紙”(即晚上通行證)，否則就不准上街，違者警察拘捕，無冤可申。直到1897年6月，才取消了宵禁令。³⁴ 1857年1月6日，時任香港總督包令以維護香港的和平與治安為由，頒佈了確保殖民地和平的法令，其中規定了夜紙的範式，頒佈與撤銷，以及未攜帶夜紙的相關懲罰。³⁵ 這些懲罰中包括鞭刑。

1877年以前的香港監獄中還有“行乞罪”。港英政府1858年的第8號法例第23條規定，貧苦華人不准行乞，違者可罰銀不過5大元，或可將犯此之人鞭笞，但多不過36鞭，少不過5鞭，又可將該人解回原籍。1876年第8號法例第15條進一步規定，對行乞的華人除施以鞭刑外，並可判處短期監禁和苦役，然後解回原籍或放逐別處。³⁶ 此外，香港監獄也時常會把一些老弱病的罪犯流放他處。對這種不人道的刑罰，軒尼詩也謀求改變。但是，他的請求並未得到卡納芬伯爵的支持，他稱：“關於流放的問題，目前我並未看到任何改變這一法例的原因，尤其是關於行乞者的流放。香港殖民地不應該成為廣東省的大的救濟院，解決成百上千的乞丐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他們送回原籍。”³⁷

可見，正是上述這類對華人的限制性法令使莫亞貴等大批華人被捕入獄並接受過度的鞭刑。

五、軒尼詩改革鞭刑建議

洞察到香港監獄對華人案犯的過度用刑，就香港鞭刑的殘酷性，軒尼詩首先提出了一系列人道主義的改革措施。1877年7月6日，在致卡納芬伯爵的信中，他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 中國犯人只受一次鞭刑，不准

多次鞭打。

(二) 從判決到執行鞭刑期間，犯人不
再吃懲罰性飲食。

(三) 取消公開鞭刑，以後所有的鞭刑
都在監獄內執行。³⁸

香港方面對這些建議反應不一。艾爾斯醫生表示支援，“鞭刑的目的並不是要造成終身不愈的傷害，而目前施於中國囚犯身上的卻正是這樣。”³⁹ 斯諾登 (Snowden) 法官對艾爾斯提出的鞭刑會造成不同程度的肺水腫這一問題提出質疑，但他贊同艾爾斯提出的鞭打臀部代替背部的建議，他認為“一種會給健康帶來永久性傷害的懲罰是殘忍的，也是不公正的。”⁴⁰ 提出立即取消鞭打背部並且永遠廢除。同時，他認為應該停止當眾公開鞭刑，他說：“就我而言，我認為公開展示一種嚴重的懲罰其價值是很受質疑的。”⁴¹ 威爾斯 (Wells) 和奧布萊恩 (O'Brien) 醫生一份報告中提到，鑒於九尾鞭的巨大傷害，應廢除這一刑具，用沒有結的鞭子來代替。他們還建議18歲以下的犯人鞭打臀部；13歲以下的犯人只用藤鞭；其他的犯人鞭打背部，但在受刑時犯人要戴一個厚帆布做的領子，並在腰部放一塊厚帆布，以保護其頸部和腰部。⁴²

香港按察司約翰·斯梅爾 (John Smale) 則對軒尼詩的改革建議表示反對：“我無法相信每個受過鞭刑的中國人會遭受肺水腫。……如果真如艾爾斯所說的那樣普遍，兩位仁慈的、技藝高超的殖民地醫官不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⁴³ 他指出，近幾年嚴重犯罪事件在減少。因此，儘管這種懲罰很殘酷，不適合一個高度文明的團體，但是對於一個不文明、未開化的國家的罪犯來說，鞭刑是行之有效的。而且，中國本身也是酷法盛行，有很多殘忍的致命的刑罰。所以，他認為在中國施行的鞭刑並無不妥。此外，在英國殖民大臣卡納芬伯爵給軒尼詩的回信中可以看到，他並不贊成對鞭刑作出調整。他認為，儘管香港現有的懲罰體系有一些缺陷，但還不能做出轉變或一些實質性的變更，因為這樣會給公共和平和個人安全帶來不利影響。他還

指出，中國的刑罰非常嚴酷，如果在香港建立一套相對仁慈的懲罰體系，可能會吸引廣東的罪犯逃到香港來。而且，他對艾爾斯的報告也提出質疑，要求軒尼詩對鞭刑會導致肺部水腫這一事件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⁴⁴

從鞭刑的影響來看，約翰·斯梅爾稱鞭刑的執行使得近幾年暴力犯罪事件在減少。在他看來，鞭刑雖然嚴酷，但取得了好的成效。然而，史密斯 (Cecil C. Smith) 給斯梅爾的報告中指出：

您之前提到的送往高等法院的暴力犯罪案件在減少可能會導致誤解。……在1875年的犯罪報告中，迪恩先生 (Deane) 指出，與1874年相比，嚴重犯罪行為增長了19.94%。在1876年的犯罪報告中他再次指出，與1875年相比，增長了19.43%。⁴⁵

同時，他還給出了一組1874-1876三年的嚴重犯罪的案件資料：

罪行描述	案件數		
	1874年	1875年	1876年
謀殺	3	3	4
暴力搶劫	15	13	24
入室行竊	69	107	90
企圖搶劫的襲擊	-	3	1
綁架	51	63	55
海盜	7	5	5
非法佔有	203	251	239
盜竊	802	938	1,059
尚未判決的重罪	16	13	8
總數	1,165	1,395	1,485

表三·1874-1876年間香港嚴重犯罪案統計

從這組數據可知，1874-1876三年裡，嚴重犯罪案件在逐年增加，而非減少。然而，卡納芬伯爵並不認同這一結論。在他給軒尼詩的信中指出，儘管犯罪案件有所增加，但香港的人口也在增加，按照人口比例來說，犯罪率在逐漸降低。同時，他還

城市形象

指出，之所以1875年的犯罪案件在增加，主要是因為這些案件中包含了一些小的搶劫案，而重大案件如海盜等，在逐年減少。⁴⁶

雖然一度阻力重重，在軒尼詩的不懈努力下，1881年，英國政府批准香港立法局通過第3號《修正刑罰條例》，規定：廢除流刑和烙刑；禁止公開鞭答，改九尾鞭在背上抽打為藤鞭在臀上抽打，且不得在同一罪犯身上連續多次鞭答。此外，撤銷典獄官和普通非官守治安委員對犯人行使鞭答的決定權，只有巡理府才有此權。⁴⁷

餘論

軒尼詩對香港鞭刑的關注是在英國推行自由與公正政府的大背景下展開的，體現了人道主義和民族平等的一面，從中也可以看出在香港殖民地的政治架構下，港督在司法領域影響之大。軒尼詩對香港鞭刑殘酷性的認識是建立在與英國本土和其他殖民地鞭刑的比較眼光中，從而開啟了以平等為參照性的提高香港華人待遇的改革。■

註釋：

1. 程漢大、李培鋒著：《英國司法制度史》清華大學，2007年，第454-459頁。
2.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30,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478.
3.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October 13,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7.
4. Flogging in Hong Kong,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8-472.
5. *Chinese Repository* (1832.5-1851.12), 12/10, p. 539-541
6.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25,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6.
7.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1-462.
8. Report by Acting Superintendent, Victoria Gaol, Hong Kong, in reply to question respecting regulations for public flogging.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4.
9.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76頁
10.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轉引自徐霞輝《軒尼詩“親華人”政策與19世紀香港華人地位變遷》，載《歷史教學》2009年第18期。
11.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1-462.
12. Colonial Surgeon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8.
13.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1-462.
14. Attorney General to Colonial Secretary.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8.
15.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2.
16. Attorney-General's opinion on the illegal flogging in CHAN TIN LAM's case.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9-490.
17.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第214頁。

18.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June 8, 1879),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99.
19.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December 7,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7.
20.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6.
21.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6.
22. Mr. Justice Snowden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3-474.
23.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1-462.
24.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2.
25.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1-462.
26. *Chinese Repository* (1832.5-1851.12), 12/10, October 1843, p. 539-541.
27.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2.
28. Mr. Justice Snowden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3
29.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June 8, 1879),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98-499.
30.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第218頁
31.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December 7,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4-485.
32. Attorney General to Colonial Secretary. 27th October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88.
33.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第180、193-194頁。
34. 曹欣欣《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載《思想政治課教學》1997年第Z1期
35. An ordinance for better securing the Peace of the Colony. 6th January 185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4, Hong Kong, 1862-1881*, p. 185.
36. 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第202頁
37. Earl of Carnarvon to Governor Hennessy, C.M.G. January 3, 1878.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95.
38.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August 1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2.
39.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66.
40. Mr. Justice Snowden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3
41. Mr. Justice Snowden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June 19,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3
42. Governor Hennessy, C.M.G., to the Earl of Carnarvon (Received June 8,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500.
43. Chief Justice to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July 26,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4
44. Earl of Carnarvon to Governor Hennessy, C.M.G. January 3, 1878.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91-493.
45. The Acting Colonial Secretary to Chief Justice. July 30, 1877.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75-476.
46. Earl of Carnarvon to Governor Hennessy, C.M.G. January 3, 1878. *Area Stud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5, Hong Kong, 1862-1881*, p. 492.
47. 徐霞輝：《軒尼詩“親華人”政策與19世紀香港華人地位變遷》，載《歷史教學》2009年第18期。